

著 华德民

黑劫

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936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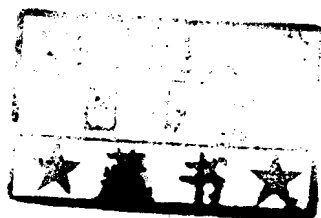
I247.5
756

黑 劫

华德民 著



200092915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年·济南

鲁新登字 09 号

特约编辑：王新华

责任编辑：周广璞

封面设计：牛 钧

责任校对：周广璞

黑 劫

华 德 民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8.5 印张 20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607—1510—9

I·111 定价：9.60 元

序

《黑劫》是一部纪实小说。它以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晚清时期洋务派兴办煤矿的一段历史。

文学批评从来都既是一种对话，又是一种自言自语。当我提笔要为《黑劫》作序时，由于它的触发，首先想要与读者诸君交流的，并不是对这部作品的评头论足，而是对彼此相关的两个特殊历史对象的认识。

一是洋务运动。这是一个被长期误解误评的历史对象，“投降卖国”的恶谥使之变成了历史舞台上的大白脸。从李鸿章到其追随者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概莫能免。如果说，同样追随李鸿章鼓吹或实际办过洋务的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冯桂芬等人因后来认识的发展，还能以“早期改良派”的某种肯定性评价在历史上定位的话；那么，李鸿章、盛宣怀、唐廷枢之流，就只能以其洋务运动的悲剧性结局而沦于万劫不复之境了。洋务运动自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局限，也自然难能逃出悲剧命运的渊薮，可是这一切，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历史条件的规约和经济、政治、文化几种重要历史结构因素的悖论性设置，不能单由这一历史活动及其代表人物来承担悲剧的责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值得下大力气研究的，应该是其中丰富的内涵和历史结构的独特形态及其效应，而不是简单的责任追究和正反判断。因为倘若如此，就会在所谓本质与现象的双重层面上对历史的真实发生全面的背离。

事实上，洋务运动从其初衷到其实际所起的历史作用，都

远非过去所讲的那样糟糕。作为一种“自强新政”，其所由起及其所希冀的，原本是对时局的认识和国家的富强与“中兴”。李鸿章的认识自然可作代表。他描述中国既有之时局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而且，更大的危机尤不得不识：“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如不以成见去曲解，这些话应该是并非耸人听闻之谈，当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敌强我弱、时有被侵袭瓜分之虞的境地之中。要自救只有自强，可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却如洋务派主持的总理衙门的奏文中所说的，“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于日久相忘。”^②因此，洋务派认为必须“自强有实”^③，发展军事工业及其他实业，方可收取实效。就如李鸿章在试办招商局的奏报中所说：“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④嗣后试作远洋航行时，他又说：“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⑤其初衷之在于保国，还是不难见出的。至于其主张引进，力倡学洋，那是因为“若舍西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第10、11页。

②③ 《同治夷务》卷九十八，第19、20页。

④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第33页。

⑤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九，第32页。

法一途，无下无足以图治者”^①，真实的想法不过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②，当与美国无涉，与其政治上弱点亦不当同日而语。

洋务派重军事，重经济，重实业，以振兴工商为“立国之本原”^③，并由此激荡起一股势头并不为小的“实业救国”之风，而且成了中国历史近代化过程第一个阶段中主潮性的历史行为和历史观念。薛福成说：“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④这种自觉的与历史求异发展的认识，和带有明显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观念与实践特征，毫无疑问地将中国历史的变异先在经济的轨道上推进了一程。尤应给予关注的是，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的二三十年中，国外列强的经济势力虽已深深地侵入中国，但还没有获得在中国自由设立工厂的权利时，以实业自强的历史举措还是适时而明智的。尽管清政府对工商业不时地进行遏抑、腹削，尽管在“官督商办”中难免发生管理中的腐败行为，尽管也遭受到传统文化心理的诸多抵制，但它毕竟创辟了中国历史近代化的一个开端，并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虽不坚实但却必要的基础。洋务派的失败，是历史的悲剧。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规约，使它无法逃避这一命运。然而，正是在它的挫败中，人们看到了非变革政治不足以图发展的严酷现实；正是因为它对科学知识的提倡和更新教育的努力，也才为文化的变革提供了先决性条件。后来以否定性认识为前提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变革的历史运动，其实都能从它那里找到或内在或外在的顺延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杞忧生易言跋》。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③ 陈炽：《庸书·自立》。

④ 《筹洋刍议·商政》。

性关联。长期以来，人们在体认和评价中国历史的近现代发展中，常常表现出对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偏重，岂不知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更离不开经济，至于历史在其实际进程中如何将诸种需求先后而有机地编排出来，那则是另外一回事。

一是近代小说。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种积沿成习的误解，就是人们在寻绎近代文学发展尤其是被认可为新质文学的生成原因时，对洋务运动和实业发展的作用有所忽视。人们也许过于习惯于在作文学评价时对历史价值评估的依赖了，似乎文学与历史发展之间存在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性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因而对历史所提供的多方面的条件，对在较长时段中不同因素的交错作用，甚至于对复杂文学现象的评价，在认识上都容易发生疏漏和错乱。

说到洋务运动及由其所带动的实业发展对文学的作用，最显见的事实是它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特殊的读者对象。作为实业之一种，印刷业的发展使众多报刊的创立和作品快捷而大量的印刷才成为可能；而文化市场的商业化，也才能使报刊和图书得到持续而广泛的流布。阿英在总结晚清小说繁荣的起因时，认为第一位的“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次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①。也许在现在看来，这早已不算什么问题，可是在当时，这一物质性前提确实是因其重要而更能被人们所感受到的，虽然文学发展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此。与实业发展相关的，现代商业化都市的形成和诸种信息交流的需求，使新闻事业发展起来，也必然影响并规约文学的发展。在近代新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

型文学为由传统到新型的转换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对于新闻传播形式的依托，由报纸副刊到刊物，都曾近代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重要发表园地。过去文学史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小说由章回体到现代结构形式的转换，而对其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报刊连载体的出现和意义却重视不够。对于当时文学与新闻事业的特殊历史关系，也常常只是一笔带过。另外，更重要的一点，不管现在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近几年来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严重失落，有责任心的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文学的非商品性的一面），当时的文学，主要是借助文化市场的商业化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小说，与诗文等文体相比，它是率先计付稿酬即商品化的，这对它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天笑谈到那时的情况时说：“当时报纸，除小说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①但说是这样说，事实上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视的。作家也要生存，只有当他所生产的产品也能转化为生存条件时，职业的作家队伍才能出现。作家的职业化，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的一个物征，或者说作家生存的一种新的方式，就是肇始于这一时期的。从1892年韩邦庆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成为最早的职业小说家之后，既办报刊又创作小说乃至只以创作为业的作家便相继出现，以至于成了众多作家基本生存方式的选择了。

在这种情势下，甚至到本世纪初的头一个十年内，许多作家都并没有把文学和实业对立起来，有的本身就是富有创辟精神的实业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积极主张引进外资，筑路开矿，而且不避风险，大着胆子去做，并终于因此罹祸，就

①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

是很突出的一例他认为,“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①,这显然与洋务运动同属一脉思潮。但是如刘鹗这种人,他们并没有用对“实业兴国”的历史选择取代或抑制文学以至于文化相对独立价值取向,而是把二者看作相辅相成的两码事,即刘鹗在《致黄葆年》中所说的“教养两途”^②。这与世纪初一些紧追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以革命家为选择的作家不同,没有把小说纯然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而给小说创作保留和开辟了更阔大的生活空间和更多的文化思考与审美创造。所以,在近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复杂或者说怪异的现象,就是文学的富有实绩的发展,与政治上的革命活动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仔细辨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像最能代表近代小说水平的四部所谓“谴责小说”的作者,在政治观念上除了曾朴因其晚出表现出更多的趋新色彩外,多数都是滞后于已构成为核心历史行为的政治变革的,有的还流露出某种不解或抵触的情绪。不可否认,历史的发展所推拥而出的重大社会变革的课题,即对已严重危及民族生存发展的政治体制的批判性对视与颠覆,顺理成章地凝结为一代小说的主题指向;小说界革命的热潮,也勿庸讳言地构成了刘鹗等人致力于小说的推动力,但是,刘鹗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分明没有表现出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加盟趋向和直接进行表现的企图。这种错位的发展,构成了近代文学的一个特异的现象。我们的文学史往往更多地关注文学与历史核心行为的一致性,却相对忽视了许多不该忽视的东西。

近代实业的发展,为文学开辟了新的接受领域和提出了新的审美趣味的需求。商业化现代都市的形成和现代都市市民阶

①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刘铁云传》。

② 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

层的出现，使文学的现代通俗品格被极醒目地凸现出来。也许为现在的读者难以理解，曾经以反对“消闲”、“娱乐”为其特征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却是首先靠近代以通俗化为特征的文化叛离从传统文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并开辟了道路的。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上海在几年内便创办了《游戏报》、《笑报》、《消闲报》、《演义白话报》、《趣报》、《通俗报》、《笑林报》、《寓言报》、《春江花月报》、《及时行乐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明显以消闲娱乐为标榜的文学性小报，它们群体性的孳生与发展，充分显示了一个潮流的规模。其影响之大，即如上面提到的某些作家，也概莫能免。李宝嘉创办过《游戏报》等，吴沃尧也曾在《寓言报》等小报中主过笔政。在对文学通俗化的体认上，更不止于办过类似小报的几个人。虽然从传统向现代通俗化的转化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复杂过程，一些有损于健康精神的低级趣味也会应运而生，但其主流性的趋势和内涵却是不容低估的。即如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并把它尊为文学之上乘，也是因为看到了它的大众性和普及性的特点，而予以推重的。上海所以会成为当时新型文学和文化的中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率先成了我国最大的开放性的现代都市。由其牵动的文化和文学的变革，以及嗣后文化中心的北移又南迁，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启示，值得我们研究。目前文学史界虽已初步涉及到这一课题，但目光和思路还未免有些过窄。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议论，都是有所感而发。若论与《黑劫》内容的关系，当以第一个问题更为切近。《黑劫》虽为文学作品，但明显地也在寻求一种历史的眼光，并以力求准确的历史价值确认作为这部纪实性小说历史真实性的可靠依据。我想，它是找到了。作者是一位小说作家，以往他对中国近代洋务派兴办实业的否定性认识，想来主要是来自历史教科书和多年来

形成的社会上的流行观点。所以他写作的初衷，还想把洋务派办煤矿写成一个笑话。然而，一个作家的责任心和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自律性要求，使他把搜集资料和构思的过程变成了一次自我超越。他没有受既有观念的羁绊，力图与历史直接对话，于是，他在“笑话”中看到了悲剧，感到了沉重。在作者的笔下，这段历史带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再现于人们面前，它所起的作用，自然已大大超出于文学之外。这一点，当是读者诸君都能明鉴的。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为文学作品作序，自然容易想到文学，于是就有了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议论，但它与《黑劫》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不过要说到《黑劫》的文学表现，倒也还是有话可说的。作者以往写的小说，多以表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和较丰富的人生内蕴取胜。这种创作个性在《黑劫》中也能被感受到。在一个阔大的历史时空内，使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变为有血有肉的生活现实，这是极不容易的。在这方面，作品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但还稍嫌单薄。

近几年，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颇多，而且似乎成了一个潮流。《黑劫》以它独有的个性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定会有其独有的意义。

孔范令

1995.9.20

目 录

序	孔范今 (1)
第一章 秋风紧	(1)
金宵一夜	(3)
同心殿上	(10)
谁主沉浮	(18)
秋风多厉	(23)
眼在燃烧	(28)
第二章 广济难	(41)
初出茅庐	(42)
阳城山前	(55)
独在异乡	(71)
洋驴技穷	(80)
第三章 荆门恨	(91)
白露为霜	(92)
拔寨荆门	(103)
汉歌难解	(112)
第四章 开平潮	(125)
升降随烟	(125)
头顶天空	(135)
山雨欲来	(146)

	地火初燃·····	(155)
	百夫之御·····	(169)
第五章	家园泪·····	(181)
	清河清清·····	(182)
	别有洞天·····	(197)
	白日见“鬼”·····	(200)
	在劫难逃·····	(209)
第六章	同舟苦·····	(223)
	重返家园·····	(224)
	细嚼苦果·····	(234)
	日坠西山·····	(247)
	还我路矿·····	(251)
后 记	·····	(257)

第一章

秋 风 紧

△1850年，大英帝国公使照会大清帝国闽浙总督刘韵珂：“欲求采购台湾基隆山煤炭，以备火轮船之用。”刘韵珂沉思片刻，端茶送客。

△1860年，大英帝国商人海德逊在天津租下房子，做生意之余，常常偕同向导跑到天津郊区。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这样写到：海德逊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系统勘察直隶境内煤矿的人！

在海德逊的《探寻煤铁记》和《中西煤铁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向大清帝国官员的建议：开采煤矿，以煤化铁。

△1861年，大清帝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军

队，率先在安庆设军械制造所。同年未至翌年，又有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开设洋枪制造局，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办马尾造船局，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天津机械制造局……在创办这些军工业的同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最让人痛心的事实：中国开采两千多年的煤炭，竟然“不合机器之用”。于是，一个最早发现煤、记载煤、使用煤的国家，开始用白银大量进口煤炭。煤，这个曾被称为“石涅”、“石墨”、“石炭”、“炭”、“煤”的物质，又有了一个新的命名：“洋煤”。

△1861年，德国地质学家、旅游家李希霍芬随德国使节来到中国。李希霍芬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考察。此人对中国进行过七次反复考察，在他呈送德皇威廉一世、二世的报告中称：仅山西省的煤炭储量，就有一万八千九百亿吨，可供全世界用一千三百年。

△1863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美国地质学家庞伯到京西调查煤炭储量，被大清帝国议政王恭亲王破例批准。

△1869年，大英帝国公使阿利国请求大清帝国官员，用机器开采煤矿，被中国官员当场拒绝。

△1874年，大清帝国恭亲王及十重臣联名上折巩固海防，引起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海防大筹议”。

金宵一夜

天尚未黑全，神午门就裂开条缝，溜出一个贼头贼脑的太监，太监四下打量一番，往后挥挥手，大清帝国亲政一年多的同治皇帝便闪出身影。两人穿的都是青衣，在夜色里不甚明晰。朦朦的夜色中，融进了两个怪头怪脑的人。

此为公元 1874 年。

纱帷柔柔，孤灯悠悠，北京城在一团漆黑里静谧得如同大海上的一座孤岛。孤岛没有灯塔，没有喧哗的海浪，远远望去，倒显得恐怖而神秘，一切的庄严和一切的残败都溶入黑夜之中。

三更已过，在距皇宫不远的一间阁楼上，一张宽大的枣木大床，卧着一国之君。这双本应洞观世界的眼睛，此刻却只盯着蚊帐顶，以及蚊帐顶上所绣的鸳鸯戏水，这种俗不可耐的图案，同治帝却看得痴痴呆呆。京城的百姓万万不会想到，这位大清帝国的万乘之君此刻正在一个三流烟花女子的房中发呆发怔。

皇宫的日子单调而乏味，每天看到的不是慈禧太后那紧绷绷的脸上吊起的三角眼，就是拱手垂立低头不语而又贼眉鼠眼的太监。春天玉兰、梨花，夏天荷花，秋天菊花，冬天梅花，灰蒙蒙的天空被勾心斗角的宫殿犬牙交错地霸占着，那变幻莫测

的天空也被这殿那阁阻挡着，闷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而弘德殿上行走的三位师傅，却还比赛着将《论语》、《尚书》、《治平宝鉴》、《贞观政要》、《大学》、《帝鉴图说》等等等等轮番着往皇帝脑袋里灌。要写，还要背，还要讲给老师听，还要根据里边的某一句话或写成文章，或写成诗。这典谟训诂的玩意儿，好像每天不把皇帝的脑袋弄炸都不肯罢休。年少的天子怎么也不明白，干嘛让他当皇上，这皇上当个什么味儿。

1873年和1874年的大清帝国，基本上是平静着的两年：云南回民起义失败，浙江新昌县的会党起义也被镇压，至于西北战局更是节节胜利，清军占领肃州后，左宗棠已有足够的把握保住西北的平安。一些迹象都昭示着“同治中兴”的可能，而在这可能的背后，也潜伏着更巨大的危险：1874年5月，日本出兵不足五千人便攻上台湾岛。

北京城里倒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但这种升平却一点儿也没有让皇帝心静下来，反倒使他更加心烦意乱：大臣之间相互争吵不休；慈禧太后眼巴巴地盼着人们为她献银子修复圆明园；户部哭穷；内务部贪污案一件接着一件；而军机处又天天吵着加强军务，加强防务……

灯光悠悠乎乎，半明半暗。窗外风轻，有蟋蟀在吱吱叫着残秋。同治帝大睁着眼，一点儿困意也没有。他刚想折起身来，没料胸中储着一个疙瘩，唉——他长出了一口气。

同治皇帝和他的继任光绪帝一样，姨兄弟两人都长着一副清瘦的面孔，眉宇间蕴含着一层灰暗的颜色。在慈禧太后那刚毅而苛薄的目光里，他极少得到应得到的母爱。在他六岁时，咸丰皇帝死去，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顾命大臣经常在殿上发怒，曾有一次，竟将他吓得尿了慈安太后一身。从此，这童年天子便害怕雷电，害怕大声说话，听到两个以上的人争论，他